

中国古典
诗学研究丛书

丛书主编 熊开发

词学散论

熊开发 著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3

194

I207.23

236

D00807194

中国古典
诗学研究丛书
丛书主编 熊开发

词学散论

熊开发 著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湖南科技大学图书馆



KD0080719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词学散论/熊开发著. -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10. 10

(中国古典诗学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5087 - 3406 - 4 .

I. ①词… II. ①熊… III. ①词(文学) - 文学研究 - 中国 - 古代

IV. ①I20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12928 号

丛 书 名:中国古典诗学研究丛书

丛书主编:熊开发

书 名:词学散论

著 者:熊开发

责任编辑:向 飞

出版发行: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100032

通联方法: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

电话:编辑部:(010)66026806

邮购部:(010)66060275

销售部:(010)66080300

(010)66051698

(010)66080360

传真:(010)66051713

传真:(010)66080880

(010)66063678

网 址:www.shcbs.com.cn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保定彩虹印刷

开 本:170mm × 240mm

印 张:14.25

字 数:220 千字

版 次: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8.00 元

湖南科技大学图书馆



KD00807194

编 委 会

主 编 熊开发

撰写者 熊开发 刘 亮 高 智

仲冬梅 李彩霞 闫金玲

闫广林

总序

《毛诗序》说：“在心为志，在言为诗。”狭义地理解，诗就是将“心”、“志”表达出来的“言”——一种独特的语言样式。广义地理解，“心”、“志”指的是人的念、想、爱、恨等一切心理或意识活动；“言”是泛指一切表达方式；“诗”指的就是将心中的念、想、爱、恨等情意呈现出来的某种独特的表达，而不只限于“言”。由诗的广、狭二义可以推知，诗学其实也应有广、狭之分。狭义的诗学指的是，以通常所说的“诗”——一种独特的语言表达样式及其相关内容——为研究对象的学说。广义的诗学则是指对一切诗意及诗意的表达和相关内容的探寻、欣赏和研究。

中国在历史上曾有“诗的国度”之誉。中国诗歌源远流长，诗人和作品流派林立，数量众多，而且诗歌在中国社会生活和文化发展中一向占有特殊和显著的地位。与欧洲相比，由于我们传统上缺少严格意义上的宗教的文化影响，所以更加倚重的是诗教，也就是以诗教化人。孔子曾经说过：“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不学诗，无以言。”《毛诗序》亦云：“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可见我们的古人从很早就开始强调诗歌的教化作用。“诗三百”不仅是文学作品，更成为儒家五经之一，被尊为《诗经》。

在中国人看来，诗人不仅传播美，更要传播真与善，他们是真善美的代表，是社会道德和伦理的代表，是一个时代的

良心和良知。诗歌抒发着一个民族的情感和精神,是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标志。

在中国漫长的诗歌历史中,出现过灿若群星的杰出诗人,浩如烟海的优秀诗作,鲜明独特的美学风貌,使古典诗歌在中国和世界文化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同时,三千年来,中国古典诗歌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由歌而诗,由古体而近体,由诗而词,进而曲,不断地发展变化为诗的艺术国度带来丰富多样的色彩。

中国古典诗学其实是一种广义的诗学,就像诗歌创作一样,诗学研究也同样是名家辈出,成果丰硕。近年来,我们海南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陆续引进了一批中青年学者,充实了学术队伍。他们大都拥有博士学位,年富力强,正是大展身手的时候。更可喜的是,这个学术团队已经形成了较为明确的学术思路与研究方向——以古典诗词研究为中心,以诗词意象理论研究为突破口,兼及其他文体及理论问题。此次我们推出的“中国古典诗学研究丛书”,正是第一批集中出版面世的研究成果。

这套丛书至少包括六本,即熊开发教授的《词学散论》,仲冬梅博士的《宋词的文化逻辑》,刘亮博士的《晚唐乐府诗研究》,李彩霞博士的《沈德潜〈清诗别裁集〉文化透视》,高智老师的《中国古典文学蓝色经典文本品评》,以及熊开发教授主编的《意象理论概要》。从内容上看,有的偏重于作家、作品、流派研究,有的侧重于理论研究,总之各有所长。相信随着这套丛书的出版,必将更好地推动本学院古典文学专业的建设与发展。

在出版这套丛书的过程中,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的领导给予了高度重视和积极支持,在出版资金等方面进行帮助,使得丛书得以顺利面世,在此表示感谢。

由于水平有限,这套丛书中难免会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恳请学界各位专家学者不吝赐教,以帮助我们改正和提高。

2010年6月

引言

本书内容主要是有关词学研究的,而所谓“词学研究”,我理解就是关于“词”这门学科的全部内容的研究。1935年初,龙榆生先生主编的《词学季刊》揭开了以“词学”命名的词学研究的序幕,至1981年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创刊《词学》,明确提出在古典文学领域创立“词学”专业,词的学科疆域判然独立,学科独立性也在古典文学研究界得到公认。然“词学研究”究竟研究什么,本来看似不成问题,但推敲之下,却仍不免令人生疑。唐圭璋、金启华先生在《词学》创刊号上发表的《历代词学研究述略》一文中指出,“词学”作为一个专业,其研究方向大致应为“词史、词乐、词律、词韵以至版本校勘、笺注等等”。我们可以看出,这里所谓“词学”,主要指的是关于词的文本的学术研究,换句话说,就是对词的物化的存在形式或现象,也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作为客观存在的词及相关内容的研究。近三十年过去,词学研究的疆域虽然早已突破了两位先生的划定,但词学研究的对象性质似乎并无根本改变。所谓“词学研究的对象性质”,这里指的就是,词学研究的对象,无论是传统的“词史、词乐、词律、词韵以至版本校勘、笺注等等”文本性客体研究,还是词的艺术性、思想性甚至现实性(古为今用)这些观念性客体研究,其共同的性质都是所谓的客观存在性和客观真实性。因为观念性存在也只是客观存在的反映,所以一切研究说透了都不过是对“客观的”、“客

体的”词及词人的研究。

依照这种“词学研究”的学科界定,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本书中的前四章内容似乎都非客观性的“词学研究”所能容纳。如第一章的“词缘起之主体性因素”,虽然探讨的属于词史(词的起源)问题,但其思路却非依存于典型的客观式方法——即从某些客观现象推导出一个客观结论,而是从一些似乎并非客观存在的“意识现象”或荣格所说的“心理实在”^①来探讨词的起源中主体性因素的重要作用。再如“词心研究”,也不是一般意义的范畴研究——只是为了梳理“词心”作为晚清词评家的一个批评范畴的理论演变,而是更多地着眼于“词心”与“文心”、“诗心”甚至“禅心”的区别,去探究词人创作中可能存在的一种独特的主体意识及其可能给词的创作带来的作用。至于“词人审美悟性研究”,同样也是力图通过词作品的阅读和分析,去描摹和重建词人独特的主体意识和审美心理。这些都是有关“意识现象”和“心理实在”的研究,而非传统的客体或文本研究。这些非传统的研究,并不只是在玩弄一些新名词,而是想借鉴现代哲学和语言学的从外部世界向意识世界的转向,来尝试古典文学研究向内的观念转向。

本书后三章虽然部分内容依然延续了主体性研究的特点,但研究指向的对象及其方法则基本回归到传统。对唐宋词意境的研究,着重解释的是,词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在与其他文学样式尤其是与诗相比较时,其意境营造及意境韵味的独特性究竟是怎样体现出来的。其中“词境营造的着意与用心”部分,则更多地从“领字”的运用、关联动词“是”的缺失、词的议论性、词的节奏与情感和虚字、用事与过片等细节方面研究了词境营造的独特性。“词人研究”一章中的“为人类担荷罪恶的李后主”部分,曾以《“十字架”上的李煜》为题(有节选)公开发表过。^②这一部分立足于王国维对李后主“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的评价,分析了传统儒家思想、佛教和基督教等关于“罪恶”、“担荷”的理论,

① 这里的两个概念都有特别所指,“意识现象”系借用胡塞尔等现象学家的“现象”学说,即一切现象究其实都只是意识现象,而并非唯物主义哲学所指的与“本质”相对的“客观现象”;“心理实在”则是荣格心理学的一个核心范畴,即认为真实的存在并非所谓客观存在,而是“心理实在”。更详细的论述可参见本书中二、四章内容。

② 本文发表于《比较文学》2006年第3期,书中还有若干部分也曾节选公开发表,如“词源起中的主体性因素”、“词心说”、“论唐宋词人的审美悟性”和“从辛弃疾作品的儒道释倾向看他的人格特征”等。

从宗教哲学的“终极关怀”的角度来揭示李煜悲剧的文学和历史意义,在同类研究中也应该算得上是别开生面。

本书的不足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研究延续时间长达二十多年,前后关注的问题并不完全相同,所以内容略显芜杂;作为一部专著,全书前后的风格也不尽统一。总之,书中还存在很多问题,真心地希望各位方家、读者批评并赐教于我。

2010年6月于海口

目录

词学
散论

001 总序

003 引言

001 第一章

■ 关于词缘起的研究

■ 一、词缘起诸说

009 二、词缘起之主体性因素

021 第二章

■ 词心研究

■ 一、词心说

022 二、词心的独特表现

025 三、词心与绵延

031 四、绵延理论的补充说明

036 第三章

■ 词心、诗心与禅心

041 一、禅心说

045 ■ 二、诗心说

050 ■ 三、词心与禅心比较

057 ■ 第四章

■ 词人审美悟性研究

■ 一、审美悟性概说

058 ■ 二、词论中的审美悟性发源

066 ■ 三、诗词审美悟性有别

073 ■ 四、感伤的意味

079 ■ 第五章

■ 词境研究

083 ■ 一、唐宋词意境的美感特征

084 ■ 二、词境、诗境比较

096 ■ 三、词境营造的着意与用心

103 ■ 第六章

■ 词人研究

104 ■ 一、为人类担荷『罪恶』的李后主

113 ■ 二、以旅途为人生的柳永

122 ■ 三、思情困惑中的晏氏父子

134 ■ 四、情理相激又相融的辛弃疾

147 ■ 第七章

■ 词学杂论

148 ■ 一、词与音乐

158 ■ 二、咏物词琐谈

175 ■ 三、词人杂议

203 ■ 四、『兴发感动』的批评启示

211 ■ 参考文献

中国古典
诗学研究丛书
丛书主编 戴开发

词学散论

第一章

关于词缘起的研究

一、词缘起诸说

1. 词缘起于古诗(诗骚)

(1)王灼《碧鸡漫志》卷第一：“古人初不定声律，因所感发为歌，而声律从之，唐、虞禅代以来是也，余波至西汉末始绝。西汉时，今之所谓古乐府者渐兴，晋魏为盛，隋氏取汉以来乐器、歌章、古调并入清乐，余波至季唐始绝。唐中叶虽有古乐府，而播在声律则鲜矣；士大夫作者，不过以诗一体自名耳。盖隋以来，今之所谓曲子者渐兴，至唐稍盛，今则繁声淫秦，殆不可数。古歌变为古乐府，古乐府变为今曲子，其本一也，后世风俗盖不及古，故相悬耳。”

(2)清·沈祥龙《论词随笔》(《词话丛编》第五册)：“词者，诗之余。当发乎情，止乎礼义，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离骚》之旨，即词旨也。”

(3)清·汪森《词综序》：“自有诗，而长短句即寓焉。《南风》之操，《五子之歌》是已。周之颂三十一篇，长短句居十八；汉《郊祀歌》十九篇，长短句居其五；至《短箫铙歌》十八篇，篇皆长短句。谓非词之源乎！迄于六代，《江南》《采莲》诸曲，去倚声不远。其不即变为词者，四声犹未谐畅也。自古诗变为近体，而五七言绝句，传于伶官乐部，长短句无所依，则不得不更为词。”

(4)郭频伽云：“词家者流，源出于国风，其本滥于齐梁。自太白以至五季，非儿女之情不道也。宋之乐，用于庆赏饮宴，于是周、秦以绮靡为宗，史、柳以华缛相尚，而体一变。苏、辛以高世之才，横绝一时，而愤末广厉之音作。姜、张祖骚人之遗，尽选秾艳，而清空婉约之旨深。自是以后，虽有作者，欲别见其道而

无由。然写其心之所欲,出而取其性所近,千曲万折,以赴声律,则体虽异,而其所以为词者,无不同也。”(清·江顺诒《词学集成》卷五,《词话丛编》第四册)

(5)刘熙载《艺概·词曲概》:“词导源于古诗,故亦兼具六义。六义之取,各有所当,不得以一时一境尽之。”

认为词源起于古诗的观点,主要从三个方面建立联系。其一是旨意(义、礼义),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六义之取,各有所当”,凡诗(词也是诗)皆同此意,故诗词一脉相承。其二是长短句式,“自有诗,而长短句即寓焉”,一言道尽。其三,既相关又不相关,所谓“感发为歌,而声律从之”,古来由此,所以“古歌变为古乐府,古乐府变为今曲子,其本一也”——这是相关处;但所本之声,即今(宋)之所谓曲子者,却是自“隋以来”才渐渐兴起的——这是无关处。

2. 词缘起于古乐府

(1)沈括《梦溪笔谈》卷五《乐律》一:“诗之外又有和声,则所谓曲也。古乐府皆有声有词,连属书之。如曰贺贺贺,何何何之类,皆和声也。今管弦之中缠声亦其遗法也。唐人乃以词填入曲中,不复用和声。此格虽云自王涯始,然贞元、元和之间,为之者已多,亦有在涯之前者。又小曲有‘咸阳沽酒宝钗空’之句,云是李白所制,然李白集中有《清平乐词》四首,独欠是诗。而《花间集》所载‘咸阳沽酒宝钗空’,乃云是张泌所为,莫知孰是也。今声词相从,唯里巷间歌谣及《阳关》《捣练》之类,稍类旧俗。然唐人填曲,多咏其曲名,所以哀乐与声尚相谐会。今人则不复知有声矣,哀声而歌乐词,乐声而歌怨词,故语虽切而不能感动人情,由声与意不相谐故也。”

(2)胡寅《题酒边词》:“词曲者,古乐府之末造也。古乐府者,诗之傍行也,出于《离骚》《楚词》。而《离骚》者,变风变雅之怨而迫、哀而伤者也。其发乎情则同,而止乎礼义则异。名之曰曲,以其曲尽人情耳。”

(3)“梨庄曰:徐巨源云古诗者风之遗,乐府者雅之遗,苏李变而为黄初,建安变而为选体,流至齐梁排律,及唐之近体,而古诗遂亡。乐府变为《吴趋》《越艳》,杂以《捉搦》《企喻》《子夜》《读曲》之属,以下逮于词焉,而乐府亦衰。然《子夜》《懊侬》,善言情者也,唐人小令,尚得其意。则诗余之作,不谓之直接古乐府不可。予谓巨源之论词之源于乐府,是矣。”(清·徐钊《词苑丛谈》卷四)

《品藻》二)

(4)“朱竹垞先生《群雅集序》云:用长短句制乐府歌词,由汉迄南北朝皆然。唐初以诗被乐。填词入调,则自开元天宝始。”(清·江顺诒《词学集成》卷一)

认为词源起古乐府,主要围绕以下几点展开:其一,合乐。所谓“古乐府皆有声有词”,词亦同之。其二,缘情。古乐府与词都是能“曲尽人情”,“善言情者”。其三,既相关又不相关,相关处是,“用长短句制乐府歌词,由汉迄南北朝皆然”;不相关处是,“填词入调,则自开元天宝始”。

3. 词缘起于六朝

(1)宋·朱弁《曲洧旧闻》:“词起于唐人,而六代已滥觞矣。”

(2)杨慎《词品》卷之一:“填词起于唐人,而六朝已滥觞矣。”

(3)王世贞《词评序》《古今词统·旧序》:“词者,乐府之变也。昔人谓李太白《菩萨蛮》《忆秦娥》,杨用修又传其《清平乐》二首,以为调祖,不知隋炀帝已有《望江南》词,盖六朝诸君臣,颂酒赓色,务裁艳,默启词端,实为滥觞之始。”

(4)清·徐世溥《悦安轩诗余序》:“乐府变为吴趋、越艳,杂以《捉搦》《企喻》《子夜》《读曲》之属,流为诗余,诗余流为词……则诗余者,接乐府,通歌谣,开词曲……及其源始于吴声小令。”

(5)清·毛先舒《填词名解略例》(《词学全书·填词名解》):“填词缘起于六朝,显于唐,盛于宋,微于金元。自后南曲大兴,而其调多与填词合,得知斯道与气运相为盛衰。”

认为词源起六朝的理由是,其一,“颂酒赓色,务裁艳”的特点相同。其二,与六朝乐府、歌谣诗相关。其三,与气运盛衰相关。其实,这一类观点,与认为“词源起于古乐府”的观点有许多重合之处,甚至可相互补充说明。

4. 词缘起于隋唐

(1)李清照《词论》

乐府声诗并着,最盛于唐。开元、天宝间,有李十八郎者,能歌擅天下。……自后郑卫之声日炽,流靡之变日烦。已有《菩萨蛮》《春光好》《莎鸡子》《更漏子》《浣溪沙》《梦江南》《渔父》等词,不可遍举。

(2)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

唐初歌辞，多是五言诗，或七言诗，初无长短句，自中叶以后，至五代，渐变成长短句。及本朝，则尽为此体。

(3) 陆游《跋花间集》

唐自大中后，诗家日趋浅薄。其间杰出者，亦不复有前辈闳妙浑厚之作，久而自厌，然桎于俗尚，不能拔出。会有倚声作词者，本欲酒间易晓，颇摆落故态，适与六朝跌宕意气差近，此集所载是也。大中以后，诗衰而倚声作。

(4) 清·田同之《西圃词说》(《词话丛编》第二册)

诗词风气，正自相循，贞观、开元之诗尚淡远，大历、元和后，温、李、韦、杜渐九《香奁》，遂启词端。《金荃》《兰畹》之词，概崇芳艳。南唐北宋后，辛、陆、姜、列渐脱《香奁》，仍存诗意。

(5) 明·俞彦《爱园词话》

词何以名诗余？诗亡然后词作，故曰余也。非诗亡，所以歌咏诗者亡也。词之然后南北曲作，非词亡，所以歌咏词者亡也。谓诗余兴而乐府亡，南北曲兴而诗余亡者，否也。

(6) 清·刘体仁《七颂堂词绎》(《词话丛编》第一册)

诗之不得不为也，非独《塞夜怨》之类，以句之长短拟也。老杜《风雨见舟前落花》一首，词之神理备具，盖气运所至，老杜亦忍俊不禁耳。观其标题曰“新句”，曰“戏为”，其不敢偃背“大雅”如是，古人真自喜。

(7) 清·田同之《西圃词说》

渔洋王司寇云：……诗之为功既穷，而声音之秘势不能无所寄。于是温、韦生而《花间》作，李、晏出而《草堂》兴。此诗之余，而乐府之变也。语其正，则南唐二主为之祖，至《漱玉》《淮海》而极盛，高、史其嗣响也。语其变，则眉山导其源，至稼轩、放翁而尽变，陈、刘其余波也。

(8) 张惠言《词选序》

词者，盖出于唐之诗人，采乐府之首，以制新律，因系其词，故曰“词”。传曰：“意内而言外，谓之词。”其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